

顾奎相 陈 澹 著

中国古代改革成败论

湘岩文存二集

创新，是历史科学繁荣和发展的原动力，是每位历史学人刻意追求的学术目标。没有创新，即使著作等身，对学术市场来说，带来的只是虚假繁荣，而无实际学术意义。

摘自

《关于史家思维方式的思考》



辽宁大学出版社

顾奎相 陈 澹 著

中国古代改革成败论

湘岩文存二集



辽宁大学出版社

©顾奎相, 陈浣 200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改革成败论: 湘岩文存二集/顾奎相, 陈浣著.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4
ISBN 7—5610—4678—2

I. 中... II. ①顾... ②陈... III. 政治制度—研究—
中国—古代 IV. 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2055 号

责任编辑: 常江
责任校对: 齐月

封面设计: 刘桂湘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编: 110036

联系电话: 024—86864613 <http://www.lnupress.com.cn>

Email: mailer@lnupress.com.cn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 140mm×203m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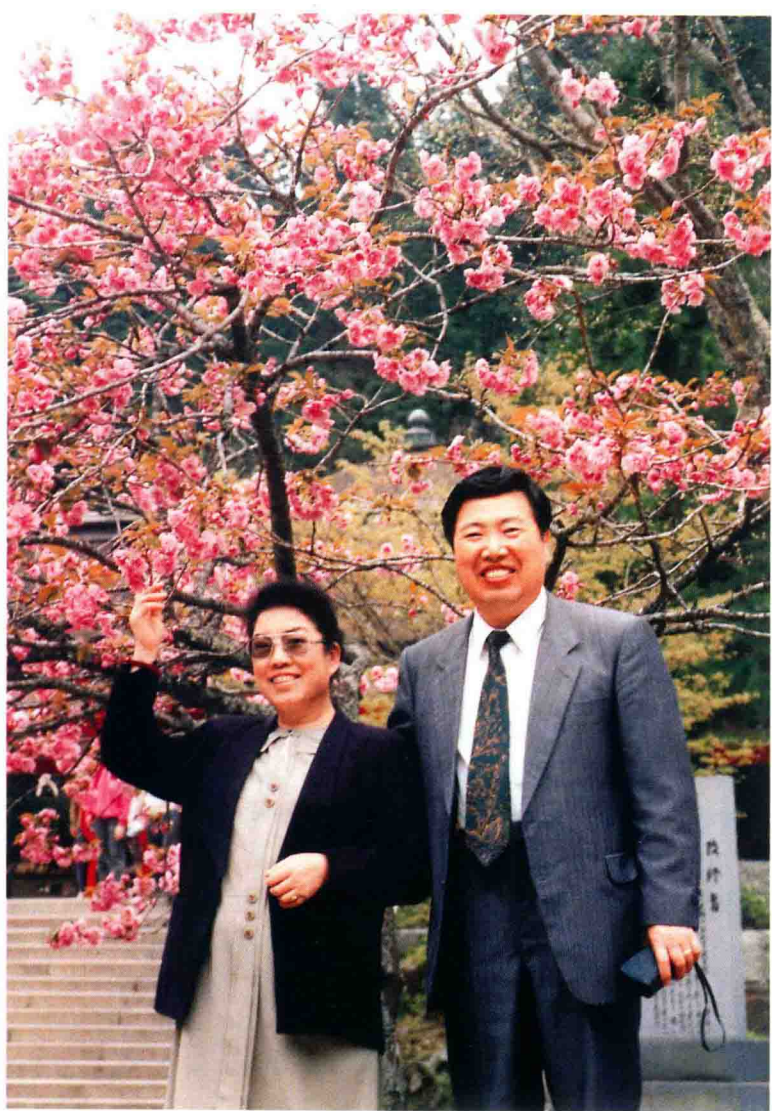
印张: 12.5

字数: 310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摄于日本大阪府高野山(1995)

作者简介

顾奎相 1939年生于辽宁省岫岩县。1965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原任辽宁大学副校长，现任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辽宁省历史学会理事长、辽宁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山东大学兼职教授、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荣誉市民。主要致力于改革史、史学史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司马光》、《中国古代改革家》、《中国古代改革史论》、《湘岩文存》、《〈资治通鉴〉选读》（合作），主编《亚洲史上十大改革》、《改革理论探索》、《改革十年 奋进十年》等。1993年被授予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陈 澹 1941年生于湖南省安化县。1965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现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研究员、沈阳市政府参事，兼任辽宁省历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明清史和中国改革史研究，主要著作有：《皇太极》、《中国古代改革家》、《中国古代改革史论》、《湘岩文存》，主编《亚洲史上十大改革》等。还参与了《清代人物传稿》、《中国历史大辞典》、《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辽宁省社会科学志》、《沈阳市民族志》等多部合作成果的编撰。1994年被授予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序 言

我们进行中国古代改革史研究发端于1984年，于1992年1月出版《中国古代改革史论》一书，自谓数年心血凝成之作，然将成书再行检阅之时，只觉言犹未尽。这是因为写作当时，受篇幅和时间的限制，未能尽言。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改革历史文化内容之丰富，若要详尽论述之，何止数十万言可完此任，作为这一领域的初始之作，我们只举其大要以述其原委，论其主旨，加之庶务冗繁，时受干扰，写作时间不免仓促，漏略和浅陋之处自是必然，深感有从容深入研究之必要，有进一步补充、阐发之必要。由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停顿下来，十年间，继续对一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将心得写成一些篇什，虽篇章不多，雪泥鸿爪而已，窃思凑成一册，以便翻检，因有是集。集中敛入之文有几篇写作于《中国古代改革史论》成书过程中，为反映我们重点研究问题之全貌，故一并收入。

哀辑旧文，我们于改革史研究之主要旨趣所在的印迹清晰可辨。李大钊曾告诉人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研究历史的任务》）他用如此简单明了的话语对历史学的内涵作了表述，我们认为，改革史是一门专史，那么，改革史的内涵就是以真确的证据整理历史上改革的事实和通过研究，理性地认识这些事实，并总结出其“进步的真理”。这里所说“真理”，我们理解，即是规律。从这个集子所收文论的内容可以看出，我们研究改革史之旨趣主要在于寻求改革之

“进步的真理”，即规律方面。我们解剖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三国、宋、元，及至明、清各个时期的重大改革，从中探寻改革与国家兴衰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改革的作用和历史意义、改革成功或失败的原因等一些规律性问题。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改革的成败问题。从原则意义上讲，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之举，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它的成功是历史的必然，也惟其成功，它才能起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作用，它才具有进步意义。然而，事实上，历来的改革却有成有败，那么，何以成，何以败呢？这个问题是改革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否也有规律可循，这是尤其应当搞清楚。是集中《中国古代改革成败论》一篇就这个问题作了专门论说，其余如《“庆历新政”夭折的思考》、《张居正改革的典型意义》、《漫议历史上的封建政体改革》等篇也主要是论说这个问题的。正是出于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也出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些工作的实际，这个集子就以《中国古代改革成败论》为名。

本书集中搜罗了我们关于改革史研究的文论凡 20 篇，其中特别要提出的是《改革史应成为一门专史》和《20 年来中国改革史研究述评》两篇，这是我们对改革史这门新的专史学科 20 年来从兴起到发展状况的总结，反映了改革史研究兴起之后蓬勃发展的历程，说明一门科学的茁壮的生命力。20 年来，众多史学工作者乃至著名史家以改革史这个新视角重新审视历史这门古老的学问，大家的共识使改革史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新热点，迅速发展。改革史生成、发展已历 20 春，作为一门学问，一个学科，恐怕是还太年轻，还刚刚在成长，但犹如孩童的周岁纪念照一样，我们感到有必要为它这 20 年来的研究情况也留下一张纪念照，于是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总结，写了《20 年来中国改革史研究述评》一文，尽管我们的总结和

对问题的认识未必毫无遗漏，也不见得把握得十分准确，但这种检视不仅必要，而且于其继续发展是有意义的。

在 20 年的研究工作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从学科规范意义上来看，改革史已具备了成为一个学科的全部条件：可能性、必要性和规范性。就是说，社会改革历史的客观存在，为改革史学科提供了明确的学科定义和研究对象，使之具有生成和发展的可能性；改革史在提升民族的变革意识和创新精神、为现实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和历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等方面能够承担独特的社会任务，对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使之成为社会必要之学问；凡学科必有其规范，亦即制度，它的内涵包括要有明确的学科定义和研究对象、有悠久的学术研究史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学界普遍认同并有知名专家和代表性著作、有明显的学科独立性等等，改革史发展到今天，已经完全具备了这种规范性。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以极为认真的态度撰写了《改革史应成为一门专史》一文，并特别将其放在文集的首篇位置，一是将此视为我们 20 年研究改革史之总结论、总成效；一是以示此问题之重要和以期引起学界及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白此心愿，期之于成！

还要赘言几句的是，在进行改革史研究的同时，我们当然也关注整个历史学的发展问题，应邀参加一些史学学术会议，或为友人文集写一点文字，或为地方史学之发展尽一点组织推动之力，也累积一些文字，近年来在改革史文论之外与历史有关的文论 19 篇也收录进了本集中，敝帚自珍，聊可自慰而已！1995 年，我们曾将多年合作之关乎改革史之外的史学文论结集出版，以《湘岩文存》名之，这次以改革史研究成果为主所辑是集，故副题为《湘岩文存二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用一个生动的比喻形容从事科学研究之不易与决心的重要，他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

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20年前，我们正当年富力强，毅然调整各自的科研方向，大胆闯入一个新的科学入口，今天，已逾休致之年，回眸走过的路，看到一支改革史研究的队伍日见壮大，在希望的鼓舞下，我们将抱定初衷而不改，在选定的这条路上和同志者一起继续走下去，为这条新路多铺石填土，为这片园地增添些新绿肥红！

作者

2004年3月15日于陵东寓所

目 录

- 序言 1
- 改革史应成为一门专史 1
- “改革史”新学科的建立纵谈 9
- 春秋战国时期改革之同异及启示 17
- 三国鼎立成因新论 32
- 改革失衡与三国倾斜 46
- “庆历新政”夭折的思考 56
- 欧阳修改革思想与改革实践论略 61
- 蒙古族历史上一次重大改革 77
- 张居正改革的典型意义 84
- 清前期的改革与兴盛 96
- 论清前期改革得失及政权兴衰 106
- 努尔哈赤于女真社会变革之作用 121
- 论努尔哈赤改革与女真族社会变革 131
- 锐意改革的雍正 135
- 变革学界主潮 开创史学新风 142
- 漫议历史上的封建政体改革 156
- 中国古代改革成败论 164
- 邓小平改革理论与历史研究 174
- 辽宁“改革史”研究概况与前瞻 184

MULU

- 20 年来中国改革史研究述评 190
- 繁荣新世纪史学四论 211
- 21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态势瞻望 217
- 关于史家思维方式的思考 230
- 陈光崇教授访谈录 244
- 地方史研究法述要 261
- 历史科学的出路在哪里? 271
- 加强和推动辽宁地方史研究 276
- 辽宁史学百年 282
- 辽宁“史学史”研究态势概述 302
- 廉政建设的历史考察 319
- 传统治国之策的继承与升华 335
- 想起张居正行“考成法” 338
- 南汉山城之战及其影响 342
- 拥立福临继统的首倡者究竟是谁? 364
- 宋朝享国与文化建设 371
- 评《曹操今论》 381
- 评《王安石人才思想论稿》 385
- 喜读《奉樾集》咏史怀古诗词 389
- 《葫芦岛地方史文集》序 392

改革史应成为一门专史

历史学包括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科技史、史学史、民族史等子学科，这些专门史从多个层面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历史面貌和进程。近 20 年来，一门新的学问——改革史蓬勃兴起，按一门新学科应具备的各项要素加以衡量，我们认为它有资格、有条件与前述各门专史为伍，成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二级学科。其理由如下：

(一)

任何一门专史的生成和发展，其基本前提是要有明确的学科定义和研究对象，改革史具备这一条件，因为社会改革历史的客观存在，为改革史学科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性。

何为改革史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改革”这个概念。关于“改革”，史学界和理论界有种种诠释，我们认为其中邓小平的论断甚为深刻，他在论述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时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①。我们认为这一论断于认识改革有普遍意义，可以推而广之地说：改革就是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人类社会历史上，无论哪一种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在改革中不断调适生产关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由低级向高级，由不完善向完善发展、进步的。历史上所谓“变法”、“改制”、“革新”、“维新”等虽称谓各异，但其内容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2 页。

和本质都属于社会改革范畴。其成功者，都有着完善社会制度之功效，即使其失败者，也为社会制度完善的过程提供了反面的效益。今天，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专门研究社会改革之历史的学问就是改革史。

既然改革史是研究社会改革之历史的，自然它的研究对象就是贯穿社会历史始终的历次改革，其中包括改革事件、人物及发展规律。无论翻开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的历史，我们都会看到，社会改革是贯穿其始终的一条明线，我们就以中国为例，择其要作一列举。我国的社会改革之缘起可追溯到远古氏族制时代的唐尧、虞舜，之后是夏禹创立国家的改革、商王盘庚的改革和武丁的改革。周朝在灭商之前，就有古公亶父和周文王的改革。周朝建立之后，有周公旦的“成康之治”，尔后又“宣王中兴”的改革。以上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早期阶段。至于春秋战国，是一个改革大潮汹涌澎湃的时期，各国竞相改革，主要有管仲、子产、吴起、申不害、商鞅、赵武灵王等人进行的改革。秦汉大一统时期主要有秦始皇、汉高祖、桑弘羊、王莽、光武帝等进行的改革。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涌动着独具特色的改革潮，主要有曹操、诸葛亮、石勒、王猛、魏孝文帝、宇文泰、宇文邕等进行的改革。隋唐两朝，改革相继，隋文帝几项重大的改革举措，被唐太宗、武则天和唐玄宗所继承和完善，这前后几代人的连续改革使唐朝前期跃上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宋辽金元阶段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转折时期，其间主要有宋太祖、范仲淹、王安石、辽圣宗、金世宗、元世祖等进行的改革。明朝有朱元璋、张居正进行的改革。清朝世祖、圣祖、高宗各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持续进行了多项革故鼎新之举，终于造就了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在危亡相逼的近代，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救亡图存的改革持续不断。新中国成立之初，进行了土地改革、

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运动等改革。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全方位的改革使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变。如今这改革大潮正方兴未艾，有力地推动着中华民族奔向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显然，一部中国史也是一部改革史。中国如此，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皆如此。

在历史上，不仅有众多的改革家和改革运动，而且，每位改革家和每次改革都有丰富的内涵：改革措施和改革历程；改革效果和成败规律；改革家的思想、精神及际遇等。其中，各项重大制度和政策的变革、历次改革运动成败的规律，是改革史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综上所述，改革史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众多的改革人物、频繁的改革运动、丰富的改革内涵。这三大要素构建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改革历史文化资源，使改革史有足够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二)

一门专史能否生成和发展，不仅要看它有无可能性，还要看它有无必要性。所谓必要性，就是它能承担独特的社会任务，对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改革史正是历史学中时代感、现实感最强的应用型学科，在永恒的社会变革中，它一方面适应社会变革的需求，紧密地服务于现实；一方面又在参与中不断调整自己，使之在社会与学科互动中开拓前进。

具体说来，改革史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利于提升全民族的变革意识和创新精神。江泽民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只能通过改革来实现，所以，只有不断的改革才能使一个民族永葆生机和活力。

而社会改革对历史进程产生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对一个民族变革意识和创新精神的提升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和说服力。还以中国为例，管仲改革使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商鞅变法使秦国“无敌于天下”；秦始皇创建中央集权制度，这一改革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和管理模式的基本框架；赵匡胤独揽兵权、分化相权等“强干弱枝”的改革有力地加强和完善了中央集权制度……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社会改革同社会革命一样，都是历史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只有如此正确认识改革，才能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和力量。过去，改革只是政治史中占很小比重的一部分内容，那么，现在将其从政治史中剥离出去，成为专门的学问，显然大有利于全民族对其重大意义的充分认识和重视，由此获得全民族改革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的提升。

第二，利于为现实改革提供全面的历史借鉴。从总体上说，改革符合历史发展总趋势，获得成功是历史的必然。但具体落实到某次改革，就有成或败两种结局，而且，失败的概率也不是绝无仅有。比如，仅中国古代，失败的改革就不乏其例：王莽改制国破人亡；“永贞革新”不过“昙花一现”；“庆历新政”行之不足一年即夭折；“戊戌维新”百日而终，等等。改革失败以后，负面影响往往很严重，使社会矛盾比改革前更为激化，社会危机更加加深。像“永贞革新”，本以反对宦官专权为主要目的，失败后，却是宦官“威权日炽”，连皇帝的生死、废立都玩于他们的股掌之上。“庆历新政”夭折后，“积贫积弱”之国势更是江河日下，且朝野上下“惧谗畏祸，不敢挺然当国家之事”^①。“戊戌维新”失败后，中国更加速向半封

^① 《包孝肃奏议》卷1。

建半殖民地的深渊沉沦。

改革失败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警示人们：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那么，如何保证改革能稳操胜券呢？历史上的改革积淀了丰富的成败经验和教训。概而言之，最高权力、改革内容、方法步骤、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及改革家个人素质等诸方面均是影响改革成败的因素。比如，最高权力层对改革的态度就是改革成或败的决定因素。秦始皇、汉武帝、明太祖，这些最高权力的掌握者亲自主持、推行的改革尽管规模大、涉及面广、影响深刻，但都成功了。反之，著名改革家王安石主持的改革却三起三落，屡经挫折，本人两度辞相，之所以这样，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最高权力掌握者宋神宗前后态度不一，先支持，后动摇。神宗死后，改革的反对派高太后和司马光执掌最高权力，行之 17 年的改革措施就最终全部被废除了。这就是最典型的事例。改革史将这样一些事实和道理剖析得非常分明，对现在和未来的改革必定带来深刻的启迪和智慧。这说明改革史是现实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有用的学问。

第三，利于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评估历史学科的建设水准，核心标志是对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已出版的各类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和专题研究成果，几乎触及了历史的各个领域，应该说，历史学这门古老的学问已经达到了相当高度。改革史作为一门新的专史，会引领人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去认识历史前进的轨迹，特别是利于对“精英层”、“决策层”于历史发展之作用的认识，因而也就更利于人们较为完整地把握和认识历史，这是第一点。其次，深入地研究改革史，必然碰到许多历史理论问题，例如改革与阶级斗争、改革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改革与“让步政策”、改革与革命、改革与改良等，要对这些问题有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认识，必然围绕历史发展动力等理论进行再探讨、再认识，自然会丰富和完善已有的史学

理论。再次，历史学是古老稳健的基础学科，相对地说，离现实远些，而改革史同现实的改革大潮紧密相连。关心现实的史学工作者及愿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正投入改革的实践者们，渴望知道前辈走过的改革之路。史家责任和现实需求的相互作用势必使改革史研究成为历史学的一片新天地。很明显，改革史从历史学中前所未有的一个新视角解读历史，拓宽了研究领域，丰富了历史理论，拉动历史学贴近现实，无疑对历史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从一个独特的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三)

一门专史能否最终生成，除具备建立一个新学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外，还要具备不可或缺的第三要素——可行性，即学科规范性。

学科规范，亦称学科制度。其主要内涵：有明确的学科定义和研究对象；有悠久的学术研究史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学术界普遍认同，且一些知名学者直接参与并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研究内容同相邻专史既有交叉，又有明显的独立性，等等。按照上述诸点检核改革史，除前面已讲的有明确学科定义和研究对象外，其余各点也达到了学科规范的要求。

由于社会改革同人们自身利益休戚相关，所以，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们对此都很关注，浏览历史文献，就可发现记录和评论历史改革的文字史不绝书，在国内，关于古今历次改革的研究成果数不胜数；在国外，从最早的乌鲁卡吉娜改革到当代席卷全球的世界改革浪潮，也都不乏研究者和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改革史的构建奠定了厚实的学术基础。但這些研究还都是单摆浮搁的个案研究，缺乏专门史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史家们出于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积极响应时代的呼